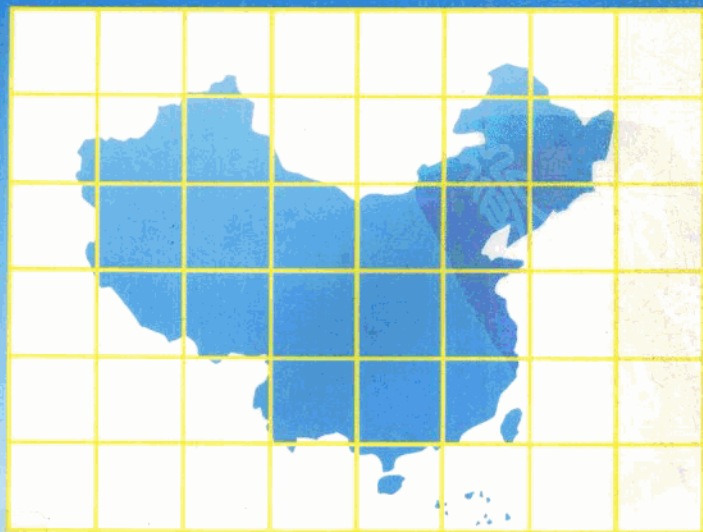


1992年中国生育率 抽样调查论文集

主 编：蒋正华

副主编：张二力 陈胜利 陈建利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

论 文 集

主 编 蒋正华

副主编 张二力 陈胜利 陈建利

中国人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蒋正华主编.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ISBN 7-80079-304-4

I. 中… II. 蒋… III. 生育率-人口调查:抽样调查-文集-中国-1993 N. C92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517 号

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 论文集

主编 蒋正华

*

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 12 号 邮政编码:100081)
北京顺义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595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400 册
ISBN 7-80079-304-4/C·79
定价:50.00 元

深入分析
人口统计资料
不断提高
科学决策水平

彭珮云

一九九四年八月

前 言

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第三次全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化速度逐渐加快、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新的变化的形势下进行的。这次调查样本规模为38.5万人,当时称为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人们习惯称为38万人调查。

本次调查获得了有关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化的新资料,涉及到婚姻、生育、节育、死亡、迁移及社会经济背景等诸多方面。这些资料对深入剖析全国及各省近年来的人口形势、制订“九五”人口计划和2010年人口发展规划、更好地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科学准确的信息有着重要的价值。为了全面开发这次调查结果,我们邀请了部分人口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本论文集是在这些人口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汇编而成的。

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近年中国的生育水平,第二部分为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第三部分为对1992年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评价。

本论文集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如何?(2)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国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3)这次抽样调查的设计方法和手段有些什么特点?

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我国妇女的生育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和生育率已从1970年5.80下降到1990年2.17。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的生育水平如何?很多人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进行了深入地论证。尽管对生育水平下降的幅度略有争议,但基本上都认为继续保持了下降的趋势。论文集的第一部分大体包括了目前人口学界对上述问题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论文集的第二部分则从初婚、避孕方式及构成的变化、生育模式及间隔及社会经济因素等角度入手对生育水平下降的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生育水平的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如何评价1992年的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的第三部分从抽样设计的方法和手段及数据检验上进行了评述。

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能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近年人口发展态势,为计划生育决策提供客观的依据,并为人口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由于汇编出版时间仓促,以及我们水平所限,论文集的编撰一定还有许多待改进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正。

蒋正华

1995年3月20日

Preface

The third China's fertility survey was organized by the Stat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1992,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state's reform and opening to worl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way of life. Because the sample size is 385,000, the survey is popularly called "survey of 380,000 people" instead of its initial name "the first survey of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e survey has provided the new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population data on nuptiality, fertility, contraception, birth control, 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etc., which is valuable for making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population situation of the state and its 30 provinces and formulating the ninth five-year population plan and program till 2010. We have invited many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to research into the survey data, and now compile their achievements into this collection of papers.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volume. Part one is about China's fertility level in recent years; part two, factors in influencing the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last part, some comments on the sample survey.

Three issues are mainly discussed here. (1) how about the fertility level, indeed? (2) which factors bring about the change in fertility? and (3) what 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sample design and technique of the survey?

The women's fertility level has declined by a large margin with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from 5.80 in 1970 to 2.17 in 1990 since 1970,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But how about the level of fertility after 1990?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by use of all kinds of methods of study, many demographers come to the common conclusion that the fertility has been showing a tendency to go down, although the extent of decline in fertility level is in somewhat dispute. Some points of view concerning fertility level are gather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volum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book embraces academic theses practically analyzing factors which have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fertility, including change in first marriage, pattern of contraception and birth control, and the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It shows that the fertility has declined as a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contributing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y, and improvement of family planning undertakings. To assess the 1992 fertility sample survey, the third part of this volume includes some viewpoints about sample design and technique of the survey and the data check.

We hope this volume is helpful to grasp accurately the state of populatio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amily planning decision-making, and supply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In

short of time and experience, this collection of papers may be somewhat inadequate to reflect all kinds of viewpoints. Readers are welcome to offer criticism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Jiang Zhenghua, on March 20, 1995

目 录

第一部分 近年中国的生育水平

正确认识人口形势 科学规划发展目标	蒋正华(3)
中国 90 年代生育趋势分析	张二力 苏荣桂(7)
1982~1992 年中国人口状况的变化	陈胜利(12)
近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于景元 袁建华(21)
去婚龄影响后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形势	林富德(35)
中国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吗	格里菲斯·费尼 袁建华(48)
我国 1991~1992 年生育率是否大大低于替代水平	曾 毅(56)
关于 1 孩到 2 孩生育间隔模式变化规律的分析	陈建利 李勇军(64)
关于中国人口形势严峻性的几点思考	冯立天 马瀛通(71)
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与预测	王东生 王彦祖(79)
中国各省生育水平的差异及其主要成因	解振明 王海京(92)
1991~2010 年中国人口生育基数	韩京清 姚翠珍(102)
人均生育基数及其应用	韩京清 姚翠珍 陈胜利(110)

第二部分 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近年来生育水平下降成因	蒋正华(133)
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	张龄广(137)
中国近年来生育水平变化的成因分析	路 磊(156)
育龄妇女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及其对生育的影响	高 凌 郝虹生(161)
文化与生育相关性研究	战 捷(199)
80 年代以来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杨书章(213)
农村社会经济及生活环境对生育率的影响	康晓平 王绍贤(224)
农村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郭震威 李勇军(230)
避孕方式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吴 忠 刘鸿雁(236)
90 年代初中国妇女的避孕情况分析	李伯华(243)
影响避孕方法选择的有关因素	王 谦 莫 莉 武 洁 鲍 谦(255)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未节育率及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刘云嵘 刘 琰(264)
中国男性节育方法现用率及其决定因素	刘云嵘 刘 琰(270)
中国人口的死亡水平与类型的变化	黄荣清(276)
人口流动与老龄化	肖振禹 郭 平(287)
外出人口特征研究	陈再华(294)

人口迁移特点研究.....	姜彬彬(300)
试论中国妇女的婚姻模式.....	冯方回(310)

第三部分 对 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评价

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方案设计特点	陈胜利(325)
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抽样误差计算与分析	郝虹生 高 凌(331)
对 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质量的检验	王海京(350)
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大事记	(359)
后记.....	(363)

• 第一部分 •

近年中国的生育水平

正确认识人口形势 科学规划发展目标

蒋正华

1 关于“九五”人口计划的编制工作

今明两年计划生育规划统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制“九五”人口计划和2010年人口规划。这是一项科学性、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国家对此十分重视。国家计委和计生委从去年底、今年初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编制人口计划前的准备工作，分析数据，研究方法，并召开了几次专家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力争把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5‰以内，到2000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力争控制在13亿以内。根据许多专家的意见，我们期望在下世纪中叶能把总人口控制在15亿至16亿。为了实现这个人口目标，我们必然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人口计划是国民经济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将计划制定得既科学，又便于操作，有利于促进工作。

人口目标的确定是经过多学科专家反复论证的优化选择。为实现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我们还需继续不懈地努力，要采取综合措施，制定相应的人口计划，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人口计划是实现人口目标的具体步骤，人口政策是制定人口计划的基本依据，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围绕着完成人口计划展开。抓住人口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抓住了政策宏观指导计划生育的关键。“八五”人口计划体现了既从严控制人口增长数量，又是经过最大努力可以完成的原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是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通过执行“八五”人口计划，增强了各级政府完成计划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计生部门广大干部、全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极大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

1986年以来，每年都有大批青年男女进入婚育年龄，每年大约有1200万对青年结婚，潜在的生育能力相当强大。这样的婚育水平一直要持续十几年，形成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三次潜在人口婚育高峰期。90年代是潜在出生高峰的峰顶期，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各级政府切实加强了人口计划和计划生育的管理，同时开脑筋，边摸索，边揣摩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与社区利益、家庭利益的结合点，创造出“三为主”、“三结合”、“少生快富合作社”、“三三金桥工程”等经验。各级计生委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服务，不仅适时地抑制了第三次潜在出生高峰，而且形成了人口持续低速增长的好势头。从执行“八五”人口计划的第一年起，创出了连续三年完成全国人口计划的好成绩，有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对抑制世界人口过快增长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编制“九五”人口计划，首先要分析研究现有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资料，判断各地的人口现状、实际生育水平以及导致人口状况变化的各种原因分析，评估不同地区控制人口增长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编制计划的基数，确定各种参数。由于近两年统计中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行为，使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一些统计数据失实，给编制人口计划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要特别注意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国家和省级编制“九五”和2010年规划时，要注意各省的不同特

点,诸如:生育政策、人口结构、民族构成及特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其中包括城镇化进程、人口迁移)等。此外,在规划中也要充分考虑计划生育工作和其他工作对人口发展已经带来的影响,研究今后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

各省现行的生育政策,除了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外,在生育二孩的政策上差别较大。有的省只照顾特殊情况的家庭生育二孩,有的省允许农村独女户生育二孩,还有的省在农村地区有计划地安排农户生育二孩。生育政策的差别必然带来生育水平的差别。要正视这种差别,实事求是地、因地制宜地编制地区人口计划。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育政策还存在差异时,不能用同一个生育水平提出计划指标。

进入 80 年代后,许多地区的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的比重逐年加大,尤其是城镇,独生子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部分独生子女在 21 世纪初陆续进入婚育年龄,按照一些省“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他们必然会对城镇的生育水平产生一定影响。这在编制 2010 年人口规划时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各省的人口构成有着较大差别。各省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和处于生育高峰期已婚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会直接影响出生率的高低。在生育多孩已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由此造成不同年份出生率的上下微动是正常的、允许的,一味追求逐年出生率都要有所降低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比例的省份,应该考虑到少数民族生育政策与汉族的不同。有些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长期居住在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生活水平较低,生产方式落后,尽管政府从各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婴幼儿死亡率相对较高,加之风俗、文化背景不同,更需实事求是地提出他们能够做到的计划生育要求。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生活方式,也会影响计划生育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兴的城镇和城镇人口、流动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近年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正在加紧酝酿,不久即将出台,这项改革措施无疑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使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城镇化进程和人口流动也给计划生育管理提出新的课题。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从 1982 到 1990 年,农村城镇数量增长 3.9 倍,而镇平均人口规模却由 22 953 人下降到 8867 人。80 年代农村城镇化的表现之一是县改市,这种县改市的过程造成了“小城区、大农村”的格局,城镇中非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农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种城镇化的结果,并没有把划入城镇区域的农业人口纳入城镇生育政策管理。目前,我们不能把城镇化进程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的有利影响估计过高。相反地,人口加速流动会造成许多新的城市人口问题,使城市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增加,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及时制定对策。

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是一种解放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些地区农村现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向需要劳动力的第二、第三产业,总的说来有利于计划生育。但是,目前我们的管理水平还较低,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措施还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迁移对各省人口总数和生育水平都会产生直接影响。有些地方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对人口计划的影响还很大。

在编制人口计划中,诸多的影响因素,难以事先全部逐一加以分析,各地应对影响本地区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重点分析研究。在编制人口计划时,应与同级计委经常互通情况,正确地估计可能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及本级对人口增长的实际控制能力,完成计划所需本部门及其他部门的配套措施,实事求是地确定各项人口计划指标。

2 加强人口形势分析

进行人口形势分析是把握人口计划执行情况,及时为领导提供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和遇到的困难,调整工作部署,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的前期基础性工作。检查人口计划的执行情况,当好领导参谋不能停留在给领导提供直接收集来的数据或测算的预测数字上,还要根据数据作出分析,以便加深对数据的认识。

每年国家统计局都组织对省级具有代表性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很多省统计局还扩大了样本量,使之对县级有代表性。近几年来,我们除加强日常的报表统计工作外,也组织了一些专项抽样调查。如:国家计生委组织进行了样本规模为38万人口的以生育节育为主要内容的抽样调查。去年大部分省(市)计生委为检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组织的专门抽样调查都对县一级有代表性。还有的省组织了生育史回顾性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为指导、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这些调查数据资料运用得还很不充分。这些调查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所得到的数据非常可贵。规统司今年上半年组织力量对38万人调查进行了深入分析,现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可是,多数调查的结果往往只汇出几个粗率就被搁置起来,从此无人问津,这是很大的信息资源浪费,令人心痛。各级规划统计部门应该重视对调查资料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从中汲取更多的有用信息,以供领导同志指导改进工作参考。

统计分析首先要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在我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是如此。统计报表数据需要评估,抽样调查、普查数据也都需要评估。调查数据的误差有方案本身设计的原因,有调查过程产生的误差,也有人为制造的干扰。进入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计划生育被排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占有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与各级党政领导的政绩直接挂钩,受到普遍重视。这一方面提高了对统计数据的精度要求,另一方面也增大了调查人口真实状况的难度。

数据质量的评价、调整是一项技术性强并需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作。它既需要理论知识,又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一般说来,数据评价有三类基本方法:(1)内部检查;(2)与其他来源的数据对照;(3)间接估计检验。我们大家都知道,出生婴儿性别比在我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整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其他年龄组的性别比总体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如果调查结果有异常,我们应该认真加以复核。这种检验就是内部检查的一种方法。我们用全国“四普”数据对照检验了“三普”数据,发现“三普”时0~4岁各年龄人口在8年后的存活率均大于1,这说明“三普”对0~4岁人口的调查有一定的漏统。这就是上面说的第二种方法——用其他来源的数据对照。目前,间接估计检验方法在国内用得还不太多。60、70年代,一些外国人口学专家为发展中国家在缺乏完整人口数据情况下,对人口增长情况做出比较可靠的估计的需要,设计了多种间接估计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以一系列的假设为前提,根据一定的经验资料提炼出的不同估计方法,因此有很强的条件限制。我们如果要直接选用其中的哪一种方法,必须首先检查使用地区是否具备这些条件,不能贸然采用。对于报表来说,目前尚没有一套现成的评价、调整方法可以拿过来用。这就需要我们动脑筋想办法,要花上一些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目前,人口统计水分问题比较复杂。这个问题也不是单靠我们计生系统一家单独就可扭转的,这就更需要我们具有较强的对数据本身判断、估计的能力。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可分为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结婚、避孕、人流等属直接影响因素。社会经济、环境是间接影响因素。目前,出生率是人口计划的重要指标,各地目标责任制中出生率也是一项主要指标,每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生育方面的信息也只有出生率。然而,出生率又不好直接用来进行纵向、横向比较。那么,如何来分析应用这个指标呢?办法是有

的。这就是将出生率标准化。我们可把出生率分解成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率两个因素,或者选择一个标准的人口年龄结构,再者是用一个标准的生育率分别求得两种标准化出生率。前一种是直接标准化,后一种是间接标准化。

我们还可将出生率变化分解为受人口年龄结构、已婚率、已婚生育率三个因素的影响,看它们影响的强度在某一地区不同年份间出生率变化中各个因素分别起了多大作用。我在去年、今年举办的主任培训班都详细讲过这些方法,希望大家都能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

生育政策的实现程度是我们分析的重要方法。近两年有些地方出生率很低,但计生率却不高,这种反常的现象需要深入分析。

控制人口出生最终要通过避孕节育来实现,因而我们分析出生情况不能不与避孕、节育情况相联系。有些地方的目标责任制中不仅设了人口控制目标,而且还有手术量等工作指标。手术量指标与人口控制指标应当是协调一致的,有个别地方应做手术的妇女全部做了手术仍然不能完成手术量指标,可见这样的计划是不能起到指导工作的目的的。但也有一些地方,过去手术量虚报较多或单纯追求手术数量,大量受术者都是已接近绝经年龄的妇女,因此,工作效果不好。生育与避孕、节育的数量关系比较复杂,但我们总能想办法把握大体关系,并在实际工作中给以比较妥当的处理。

对于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间接因素分析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初婚、避孕节育状况变化也会影响生育率上升或下降。但初婚、避孕节育变化还不能用计划生育工作完全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婚育观念必然要发生变化,按 70 年代初的生育水平计算,20 多年来,全国总共少生 2 亿多人。严格讲来,这不仅仅是计生工作的结果,还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影响的定量分析比较复杂,尤其在我国实际情况下更是如此。过去我们曾做过一些定量分析,其结果可供大家参考。

目前,省级规划人员的文化素质不错,完全有可能把人口形势分析工作搞得很好。我们要善于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每个人的专长,拿出更多的有价值的工作成果。

中国 90 年代生育趋势分析

张二力 苏荣桂

90 年代初期中国生育水平急剧下降,达到更替水平以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低的生育水平能否维持下去,更令人疑虑。我们只有认清形势,才能作出正确决策。为此,本文试图利用近年的生育调查数据,对中国 90 年代生育趋势作客观的分析。

1 对 90 年代前期生育水平的基本估计

中国自 70 年代初普遍开展计划生育以来,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总和生育率已由 4.5 降到 2 左右。对于这样迅速转变中的生育率,人们自然要关心其每一阶段的变化,尤其是近期的变化。为此,国家计生委先后进行了三次生育节育的抽样调查:1982 年的全国 1% 人口生育率调查,1988 年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2 年的国家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以下简称 38 万人调查);国家统计局自 1983 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这些调查结果都是研究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宝贵资料,但是,对近期人口出生调查的数字,尤其是当年出生的调查数字,往往是偏离实际较大。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是普遍存在,只是在当今中国将生育与人们的切身利益联系得更紧密,且对数据的精确程度要求相对较高的情况下,问题显得比较突出。近期出生漏报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抽样调查,还存在于普查。“四普”与“三普”间隔 8 年,在此期间,国际迁移人口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然而,“四普”的 8~12 岁各年龄人口数却均大于“三普”的相应年龄 0~4 岁人口数,证明“三普”的低年龄人口存在较明显的漏报。根据“三普”0 岁人口数和“四普”8 岁人口数和 0~8 岁儿童死亡率,估计“三普”0 岁人口的漏报率为 8%。由此可推断,“四普”的低年龄人口很可能也有漏报,1989 年总和生育率为 2.25 的调查结果可能偏低,实际漏报的程度还有待 1% 人口抽样调查或“五普”的证实。“四普”还证实了 1982~1989 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平均每年出生漏报约 200 万。根据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这几年不得不对每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进行调整,将调查的出生人数增加 200 万左右。1992 年的 38 万人调查当然也不例外。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对近期生育水平必须在调查数据基础上进行调整。生育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地的差异又很大,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对调查数据做出精确的调整,而只能是估计。在生育水平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外推估计很不可靠,由此可得到至多或至少的极限值,不可能求出一个准确值。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两方面的作用,90 年代初期的妇女生育情况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离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们由此认为,38 万人调查和近几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所反映的生育趋势是可信的,但具体数字偏低。初婚、初育的调查数据基本可靠,二孩和多孩的生育调查数据有较大的“水分”。国家统计局对这几年来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调整的结果见表 1。我们认为这些数字基本接近实际。

表 1 1991~1994 年的总和生育率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总和生育率	2.01	1.86	1.85	1.84

2 90年代生育趋势

对于中国 90 年代初期生育变化的认识, 有两点必须注意: 第一, 生育的时期综合指标含有“时期效应”, 某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的平均终身生育孩子数就同等程度地减少。第二, 对于中国生育水平的变化, 要从一个较长的过程来看, 而不要只限于三五年内的比较。中国实行计划生育 20 多年来, 生育水平尽管有起伏波动, 但在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是这些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坚持不懈地实行计划生育二十多年的结果。

我们先来分析时期效应。时期效应是指由于生育的年龄变化而引起的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生育的年龄首先取决于初婚年龄, 其次是生育间隔。初婚是生育的直接影响因素。中国 20 多年来生育水平的起伏波动, 都与初婚紧密相关, 在初婚“堆积”或“空档”之后,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孩生育进而是二孩生育的“堆积”或“空档。”有人把这种传递现象形容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较低生育水平下, 初婚的变化对时期生育水平的影响更加敏感。在中国终身不婚率极低的情况下, 初婚问题实际上就是初婚年龄问题, 初婚时期水平的变化就是由初婚年龄分布(初婚模式)的变化形成的。常用的初婚时期综合性指标总和初婚率和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反映初婚的时期水平和模式特征。总和初婚率是标准化指标, 平均初婚年龄则有标准化和非标准化两种。在中国年龄结构变化较大的情况下, 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的差异不可忽视, 80 年代以来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最大离差, 用非标准化指标衡量是 1.20 岁, 用标准化指标衡量则是 0.55 岁。本文凡未加说明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是标准化的。

据 38 万人调查, 80 年代后期的总和初婚率比较稳定, 平均初婚年龄变化也不大, 只是 1989 年的总和初婚率较低, 为 0.94; 90 年代初期则有明显变化, 1991 年、1992 年总和初婚率分别降到 0.87 和 0.90, 平均初婚年龄由 1990 年的 22.2 岁提高到 22.3 岁和 22.6 岁。显然, 这两年总和初婚率较大幅度下降, 是初婚模式猛然向后推移的结果, 也就是说, 按照 1990 年初婚模式, 本该这两年初婚的妇女, 有一部分推迟了初婚而出现了“空档”。

中国女性初婚在 90 年代中、后期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人们看到 90 年代初期初婚年龄提高的势头, 非常希望再现 70 年代实行晚婚的大好局面。有人认为目前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还不及 70 年代末期高, 因而对其近期内较大幅度的提高充满信心。为此, 我们对这两个年代的初婚变化做一下对比分析。70 年代中国初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79 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 1970 年的 20.82 岁提高到 22.94 岁, 九年间提高 2.12 岁; 总和初婚率持续小于 1, 最低达到 0.6。90 年代初期的初婚变化趋势与 70 年代一致, 但有几点差异必须引起注意。第一, 这两个时期初婚变化的起点不同, 1990 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比 1970 年高 1.38 岁。第二, 社会经济环境不同。70 年代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时期, 行政约束力很强; 90 年代则是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行政机制的约束力明显减弱。第三, 政策要求不同。70 年代将晚婚年龄 23 岁作为“法定”婚龄来执行, 1980 年新婚姻法颁布以后, “法定”年龄降低 3 岁。第四, 自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营养加强, 同时又受西方文化生活的影 响, 使得青少年趋于“早熟”。第五, 70 年代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生活都不安定, 他们不得不推迟初婚。这是 90 年代与 70 年代不可比的社会影响因素。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 90 年代初婚变化幅度不大可能有 70 年代那么大。但早婚控制工作不仅应达到而且应超过 70 年代后期水平。1991 年早婚年龄组年龄别初婚率的合计为 0.14, 占当年总和初婚率的 16%, 如果能在 90 年代将早婚水平降低 50%, 所带来的时期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初婚直接影响初育。直至今日, 我国妇女基本上至少想要一个孩子。近几年在上海出现年